

论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新外交

胡宗山 郭兵云

【摘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以“新型大国关系”、“亚太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一系列外交新理念;在维护国家利益等问题上形成了外交新风格;通过提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重大倡议向国际社会展现了新风采;外交领域因此不断取得新突破和新成就。在这些新变化、新动向背后,中国外交新方向正在逐渐明朗化。未来中国要制定新的大国外交战略,要在确定战略目标的同时,推进战略指导思想的调整 and 战略方针的转变。

【关键词】新外交;转型;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16)06-0040-09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未来十年中国外交和战略体系构建研究——战略调整和外交改革”(14AZD059)。

【作者简介】胡宗山(1972—),男,安徽庐江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一事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郭兵云(1981—),男,江西吉安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外交研究。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上,面对新的国内国际形势,在外交理念、外交方式等方面锐意创新,大力实施多项富有远见的新型外交举措,在多个外交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形成了若干外交亮点,不但有力捍卫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外交能力,而且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初步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外交风格,为中国未来形成新的大国外交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新外交

任何关心中国的人士都不难发现,201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外交正在逐步发生新的变化。这种新变化体现在外交理念、外交方式、外交举措、外交亮点等诸领域,并构成了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新内容、新形态。

在外交理念上,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以及十八大以后的各类讲话、公报或声明中,新一届党中央提出了若干新的外交理念、外交思想。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出时,提出了内涵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2013年3月,习近平访非期间,首次提出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对象的正确义利观。6月,习近平主席在同奥巴马总统“庄园会晤”时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10月,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总而言之,从2013年开始,为了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对外奉行什么政策、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中国开始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此后,探索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并未停止。2014年5月,习近平在

上海亚信峰会上阐述了内容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11月，在北京APEC峰会上习近平首次阐述亚太梦，使中国梦同亚太梦、世界梦相融相通。2015年，中国推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从这些新外交理念中，我们可以预见当前及未来若干年内中国外交的发展方向。

在外交方式上，十八大以来，为了更加有效地推进外交工作，新一届党中央或改进、或加强、或创新了若干外交方式，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外交能力。

一是首脑外交。首脑外交并不是一种新的外交方式，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首脑外交的广度、频度和影响度都有了量的提升和质的飞跃。从十八大召开至今约四年的时间里，习近平共出访23次，访问52个国家；李克强出访19次，到访39国。除了出席每年一度的国际峰会和领导人会晤外（如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G20峰会、APEC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亚欧首脑会议等），两位国家领导人还出席或参加了核安全峰会、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中日韩领导人会晤等。此外，他们每年还要接见数十位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或首脑。首脑外交可以避免诸多官僚作业程序直接交流，有利于推进最高层沟通的无缝对接；有时通过首脑之间的个人情谊可以缓解甚至化解国家之间的矛盾。

二是夫人外交。夫人外交是十八大以后中国外交的新发现，也是一大新亮点。习近平夫人彭丽媛良好的形象气质使她一登上国际舞台，就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为中国外交加分。“习近平夫妇出访吸引了全球媒体的注意力，对于他们，可写的内容太多太多”，对于普通人而言，“最有趣的一点或许是中国新的第一夫人作为国内和国际名片对中国品牌带来的积极影响。”对于中国而言，“第一夫人”彭丽媛不仅是国家经济品牌的“代言人”或“形象大使”，还是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儿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并参加了很多国际文化活动，较好地带动了中国的公共外交，提升了中国外交的软实力。

三是经济外交。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为中国推行经济外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经济外交方面不断有“大动作”，其中影响最大、效果最显著的是提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两大倡议，前者已经得到绝大多数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后者在约两年半内完成从提出倡议到成立的全过程。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则是“高铁外交”，李克强多次充当中国高铁的“代言人”和“推销员”，为中国高铁出口“站台”。此外，中国还强烈反对投资保护主义，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大力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努力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加快推动与相关友好国家进行本币结算的步伐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总之，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由参与性经济外交向领导性经济外交转变。

四是主场外交。主场外交也并不是全新发明的外交方式，但十八大以来，中国的主场外交无论是从量上还是质上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中国的外交能力得到明显的提升。十八大以来，每年都有数场峰会或多边对话在中国举行：每两年一次的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议（即16+1），每五年一次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以及多年一次的APEC峰会等。其中影响最大、效果最显著的主场外交主要有三场，分别是2014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亚信第四次峰会、同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APEC峰会以及2016年9月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中国充分利用主场外交，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彰显中国魅力。主场外交已经成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重要方式。

相比于新的外交理念和新的外交方式来说，十八大以后，中国在实施新型外交举措，捍卫国家核心利益方面的变化更为明显。

第一，加强对外交的领导权，更注重外交的顶层设计。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强调全面外交，更加强调具有外交职能的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改变过去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各自为政”的局面，旨在使外交政策更加正确合理，最显著的例子是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虽然外界有人对此感到疑惑，但它加强了中央的权威，有利于协调各方立场进而更好地进行顶层设计。

第二，明确利益红线，主动维护国家利益。一方面，新一届领导班子进一步明确了在钓鱼岛和南海地区的利益存在，并指出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决不允许触犯。另一方面，大力巩固和强化对核心利益的控制。2013年9月，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2014年，中国开始在南海吹沙填海，并把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开进南海作业。根据英国《经济学人》（Economist）提供的数据，2015年6月以前的18个月内，中国在南海造岛面积超过2000英亩，所建面积大于其他所有声索国历史上吹填面积的总和。与此同时，在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指

导下,中国积极发展海军力量,并有效整合海上执法力量,推进海上统一执法。此外,中国还参加国际海洋互动活动,包括联合开发工程、项目,出席或参与论坛、研讨会和双边或多边海军演习,利用每次机会表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是一个诚实而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第三,完善中国外交布局。“外交布局是国家在对外关系中根据国际力量对比和分野,对与不同国家之间关系的轻重缓急、优先顺序的安排,体现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定位,以及在对外关系中依靠谁、反对谁等内容的安排”。通过分析历届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程度的不断深入,外交布局不断完善。十四大政治报告重点强调了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提及政党外交,但没有提到多边外交,可把当时的外交布局称为“四位一体”。十五大报告在“四位一体”布局的基础上增加了多边外交,形成了内容为“周边关系、第三世界、发达国家、多边外交和政党外交”的“五位一体”布局。十六大报告进一步完善外交布局,在“五位一体”的基础上增加了民间外交的内容,形成了“六位一体”的外交布局,即“发达国家、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多边外交、政党外交和民间外交”。十七大报告中没有继续单列民间外交,增加了人大、政协、军队、地方外交,把民间外交放在它们之后且与之并列,形成了“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多边事务、政党外交以及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团体对外交往”的“六位一体”布局。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公共外交”,并把公共外交排在仅次于传统四大板块(也有学者称之为四条线)之后的第五位,形成了“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多边事务、公共外交、政党外交以及人大、政协、地方、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七位一体”的新格局。

十五大以来,中国外交布局中发达国家、周边关系、发展中国家和多边外交这四大板块一直没有大的调整,在这种连续性的作用下,学界对中国的外交布局已经形成了一个广泛共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重要舞台”。通过上文分析不难发现,“四大板块”说(或者四条线说),虽然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即它没有充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布局的变化。中国外交布局的变化,不仅仅是国际形势变化的结果,也是中国国内变化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化的结果。

第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中国支持并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但同时也明确指出,现有国际秩序是二战后由西方国家建立并主导,经过70多年的变化与发展后,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因此要推动它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其中之一就是要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举行的第一次G20峰会上,西方主要国家同意提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但久久不能落实。为了切实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2013年10月习近平提出建立“亚投行”,并于2015年12月正式成立。2014年,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下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成立。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推动下,2015年12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提高中国在其中的投票权,并把人民币纳入一篮子货币,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币成功入篮,增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国家的代表性。

十八大以来,在外交新理念的指导下,新一届党中央创新外交方式,实施新型外交措施,取得了新的重大突破,中国外交因此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一段时间内在某些外交领域被动应对的态势,很好地捍卫了中国的核心利益,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中国政府处理复杂国际事务的能力显著提升。

首先,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土和领海问题上,中国加强了在争议地区的实际存在。在东海,中国定期在钓鱼岛领海12海里内巡逻,与日本形成了对钓鱼岛的“交叉存在”,极大改变了过去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被动局面。在南海,中国通过政治外交斗争与国际公关,成功地化解了南海仲裁闹剧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同时,中国加强了对七个主权岛礁的控制,尤其在黄岩岛问题上,中国掌握更大的主动权。总体而言,中国正在逐渐改变过去在南海的被动局面,对南海局势的掌控越来越有力,对南海斗争与合作的走向越来越具有主动权。

其次,周边安全局势出现新转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华标志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在遭遇新挑战,未来有可能面临更大挑战。朝鲜核与导弹问题的恶化以及韩国同意部署美国“萨德”导弹系统后一度导致东北亚局势再度恶化,但近期中朝关系的升温以及“萨德”危机因朴槿惠总统“好友干政”事件而出现新转机,东北亚局势也在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中日关系在2014年北京APEC峰会后已基本止跌企稳。

再次,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明显提升。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设立“丝路基金”、建立“亚投行”,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创造双赢的经济机会,而是利用经济影响力,在亚洲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命运共同体”,这将使中国制定全球治理新规则,并最终拥有规范性权力(normative power)。国家实力的提升、外交经验的积累、民族自信的增加、国家意愿的增强,使中国方案成为国际治理的重要选项,中国逐步走向全球治理舞台的中央,成为主角之一。

二、中国新外交:继承与创新

十八大后,国内和国际环境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面对外交新变化,审时度势,沉着应对,制定了正确的外交政策,科学处理内政外交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外交新理念、新方式、新措施和新突破产生的根本原因。

一是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更辩证地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将加强国防建设作为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依靠。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统一性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国防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对立性通常表现为,在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国家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不得不暂时相对牺牲其中一方成就另一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府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对外则强调外交为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与国际环境服务。美国、日本、东南亚国家等既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对象,同时又在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国家安全等领域对中国构成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挑战。过去三十年,基于经济建设与和平发展的大局考虑,中国在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不受根本侵犯的前提下,对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采取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主张,实际上是以某种程度的外交忍耐来应对部分国家的挑衅。但2009年以后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在美国或明或暗的挑动下,少数周边国家打破与我“搁置争议”的默契,不断激化与我国的领土争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强国防建设,加强对争议地区的实际控制,采取更加明确有效的应对举措,提升中国对局势的控制和威慑能力才能更好地捍卫中国的领土完整。十八大以后,新一届党中央更加重视国防建设,军队反腐、军种与战区重新划分调整、内部体制改革、高精尖军备的上马、大型重要武器的研发(如国产航母、国产隐形战斗机、战略轰炸机、战略运输机等)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防实力,使中国在维护国家利益时处于更加主动和有利的位置。

二是在强调“奋发有为”的同时,更加辩证地处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韬光养晦”方针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苏联解体之际中国的正确选择,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十八大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到前台,无论从国家实力和影响力,还是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而言,中国都必须扮演一定程度的领导角色。因此,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要更加奋发有为推进周边外交”。十八大后“奋发有为”的中国外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采取实际行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如在南沙主权岛礁上吹沙造填,加强对钓鱼岛12海里内的主权巡逻,划分东海防空识别区。二是适时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与其他国家一起创建了“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使国际经济组织更加多样化和多元化。十八大后中国外交更加强调“奋发有为”,但也没有完全放弃“韬光养晦”战略,较少“当头”,也较少“扛旗”。

三是在积极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更辩证地处理国家利益与“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改革开放初期,在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吸引外资和出口各种加工产品,当时,中国企业尚未“走出去”,对外依存度相对较低,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的关联相对较弱。十八大后,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联系更紧密、更全面、更深入。在经济利益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一方面,中国经济离不开世界,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2015年,中国进出口总量246000亿元(约4万亿美元),约占GDP总量676708亿元(约11万亿美元)的36.3%。^①另一方面,世界也离不开中国。2013-201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约为26%。2015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15.5%。2014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3015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11.3%,稳居世界第一。^②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了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占全球流量份额的9.9%,同比增长18.3%,金额仅次于美国(2999.6亿美元),首次位列世界第二(第三位是日本1286.5亿美

元)。^④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如此高度相互依存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外交理念,大力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并积极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在2016年9月的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表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维和。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目前共有10支维和部队共1546人在4个联合国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⑥2015年10月,在联合国维和峰会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将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并向非盟提供总额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用于维护地区安全稳定。^⑦

在中国应对外交新变化的过程中,新的外交哲学、外交思想、外交风格逐步形成,一言以蔽之,强调“两手”战略,由“重点论”向“两点论”转变。

在外交方略上,更加注重蓝海战略和红海战略相结合。一方面,面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国周边安全和地缘经济造成的压力,在“东进”战略空间受到挤压的情况下,中国提出了“西进”的“一带一路”倡议。虽然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不稳定,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东进”空间较小的情况下,面对“西部”的开阔空间,确实存在一定的机会。另一方面,针对美国利用越南和菲律宾等与中国存在领海争端的国家作为周边地区反华的“排头兵”,中国静观其变,伺机而动。在中菲的共同努力下,菲律宾新任总统访问中国,中菲关系实现正常化。而中越关系虽然摩擦不断,但局面始终在可控范围内。

在外交手段上,更加注重刚柔并济。在中国实力相对弱小时,中国外交手段更加注重“软”的一面。十八大以来,中国实力明显增强,但并未一味强硬,而是更加注重刚柔相济。例如,在南海问题上,一方面,中国积极发展必要的海军力量,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另一方面,又主张通过双边对话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同时提出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与南海声索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在外交布局上,更加注重重点与全局相结合。十八大以来,中国从新的国内国际大局出发,完善了外交布局,从“四位一体”发展到“七位一体”,与此同时,也调整了外交布局中的优先方向。2002年,即十六大召开之际是中国加入WTO后的第一年,发达国家是中国贸易的主要对象,为了更好地发展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中国把发达国家放在外交布局中的优先地位,十七大并没有对此做出调整。十八大召开之际,美国已经开始实施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周边形势开始恶化,处理周边关系显得极其迫切。2013年,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是邻国俄罗斯,李克强担任总理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则是南亚重要邻国印度。习近平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分别是在中国两个重要邻国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最初预计成员国主要是亚洲国家。为了更好地发展周边关系,2013年,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第一次以周边外交为主题,并提出了指导中国与周边关系的“亲、诚、惠、容”理念。2013年至今,习近平出访23次,其中15次与周边国家相关,出访周边国家次数占其出访总次数的比重为65.2%;李克强共出访19次,其中出访周边国家13次,出访周边国家次数占其出访总次数的比重为68.4%。^⑧显然,周边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外交布局的重点。良好的周边关系将使中国在与以美国为首的大国博弈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并掌握更多主动权,进而更好地维护外交全局利益。

在利益维护上,更加注重当前与长远利益相结合。十八大以前,由于具有外交职能的各机构之间缺少有效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当问题出现时,各机构更多的是从本机构当前利益出发,难以顾全大局,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十八大后,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的建立,更加有效整合了国家安全和外交工作的资源和职能,加强了对国家安全和外交工作的顶层设计,各机构之间的工作和运转更加注重协调性、整体性和长远性,较好地结合了各机构的当前利益与国家的长远利益。

综上不难看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新内容、产生了新形态,形成了新风格,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外交已经彻底完成转型,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如何看待十八大前后的中国外交?十八大后的中国新外交是否意味着中国外交政策和方针的根本改变?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并没有根本改变。首先,中国的外交政策、外交原则和外交宗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践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有学者称之为“四和”路线。十八大后,中国仍然走“四和”路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进一步证明了和平发展道路的正确性,也坚定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信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⑤。在2016年的七一讲话中,习近平再次强调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事实上,习近平的外交政策是加强版的和平发展战略”。“自2012年习近平执政以来,他更加大胆和进取的外交政策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重商主义的恐惧,但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在理念和指导原则上仍然是和平发展”^⑥。

其次,中国外交布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虽然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公共外交”,并把它紧放在“四大板块”之后,中国外交布局从最初的“四位一体”发展为“七位一体”,但是“四大板块”依然是中国外交布局中的核心与根本,公共外交更多的是服务于它们。

再次,中国外交基本方针没有变。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主动地维护国家利益,大力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但这些外交举措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不当头”、“不结盟”和“不干涉内政”的“三不”外交方针。十八大后,中国继续奉行结伴而不结盟的原则,与多个国家和组织结成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层次分明的伙伴关系。目前,中国已经与82个国家和地区一体化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其中国家和组织分别为79个和3个)^⑦。在中美关系竞争性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中国仍然“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同时,中国并没有因为本国实力强大、国际地位提升而干涉他国内政,而是一如既往地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干涉他国内政、破坏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行为。以领土争端问题为例,中国并没有完全改变过去“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而是通过强有力的维权举措来巩固和强化本国的合法利益,以制止不断恶化的合法权益受损局面,同时,通过有效的威慑将相关声索国拉回到谈判桌上来。可以预料的是,如果没有中国加强在南海七个岛礁的实际存在,没有已经初步形成的多重威慑,当前南海的局面不可能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两手”战略:如果你要实现和平,就要准备战争。

总而言之,十八大以来的新外交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在外交政策、外交原则、外交宗旨和外交布局等方面以继承为主,而在外交理念、外交方式和外交措施等方面则有重大改进与创新。这些改进与创新,既与国内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有关,也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对国内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有关。事实上,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家利益的拓展、国际环境的变化必然要求新一届领导集体革故鼎新,锐意进取,即创新外交方式,提出新理念,采取新措施,以更好地维护和实现中国国家利益,十八大以来的新外交因此而产生。

三、中国新外交:未来展望

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外交新成就和新突破,坚定了中国进一步实施外交转型的信心和决心,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更加需要向新的大国外交战略转型。所谓大国外交战略,就是服务于中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为未来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长远谋略和宏观规划,以更好地捍卫、实现和拓展中国的国家利益。

首先,它是中国应对外交新常态的需要。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进入新常态,即国际形势混沌化,国际秩序失序化;大国博弈复杂化,双边关系呈现出多面性;国家目标高端化,利益诉求越来越全面;领土争端长期化,国家安全形势不容乐观。^⑧如果说经济新常态是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中国制定发展战略必须面对的最大实际的话,那么,外交新常态则是中国制定外交战略必然要面对的最大实际。无论是在混沌化的国际秩序中还是复杂化的大国博弈中,中国都处于核心圈层,只有更具外交定力,对国家实力更有信心,制定更具全球性、宏观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外交战略,才能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才能应对复杂的大国博弈。面对长期化的领土争端和高端化的国家目标,中国需要进一步发展本国实力和提升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国际话语权和规范性权力,制定更加全面、细致和深入的外交战略和解决方案,才可能使领土争端早日解决,国家目标尽快实现,这些都是大国外交战略的应有内容。

其次,它是中国完成国家成长的需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进

程不可逆转。就国内大局发展趋势而言,虽然中国面临着经济下行压力大、贫富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环境污染严重、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但总体而言,这些问题都在可控范围内,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共产党执政得到国内民众支持,政治局势十分稳定。从国际大局来看,虽然中国外交进入新常态,面对诸多问题与挑战,但是国家实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经验的积累使中国能够更加从容、自信地处理国际问题。作为未来国际社会中的世界大国,中国需要提前制定相应的大国外交战略,这样将有利于中国更快、更好地从区域性大国成长为世界大国。中国需要在客观评估本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基础上,准确合理地预判中国的发展趋势,提前制定大国外交战略,抢抓战略机遇期,以早日实现外交转型。如果机械地认为只有等到中国发展壮大后再制定大国外交战略,将可能错失战略机遇期,最终延迟甚至阻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

再次,它是中国实现国家利益的需要。在全球化程度不断深入以及中国国家实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对外开放深度和广度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之广度、深度和粘度均发生深刻变化。就广度而言,中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遍布世界每一个国家,几乎每个国际热点问题或国际事件都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利益。就深度而言,中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核武器扩散等问题上,中国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这些问题也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相关利益。就粘度而言,国家利益与国家关系高度复杂化,很难对一些重要双边关系简单定性。例如在经济关系上,美国和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但它们也是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周边稳定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同时,中国与美、日在全球气候等重大问题上既竞争又合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俄关系,在政治和战略关系上,俄罗斯是中国最重要的伙伴,但两国经济关系一直不够紧密。新时期中国国家利益的这些特征,要求中国必须改变过去被动式、反应式、救火式、办案式的外交风格,解决外交方针粗略化、外交行动被动化、外交决策零散化、外交资源集中化、外交谋略短期化、外交方式单一化等问题,否则,中国国家利益必然受到损害。换言之,中国只有及时实现外交转型,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大国外交战略,才能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新外交预示着中国外交转型、外交变革正在路上。“亚太梦”、亚洲安全观、“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是中国优先发展周边关系的具体表现,习近平在新加坡演讲时强调中国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这表明中国深知要做世界大国必先稳定周边关系的外交规律。首脑外交空前活跃、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新外交形式和措施表明中国外交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充分利用主场外交对国际重大问题阐明中国立场、提出中国方案,表明中国更加科学合理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总而言之,十八大以来的新外交表明,中国在从参与型、融入型外交向领导型外交的转变过程中,无论是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相比,还是跟目前世界舞台上的其他国家相比,外交越来越具有大国色彩和大国风格,为未来形成大国外交战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尽管中国外交初步形成了大国外交的色彩和风格,为未来外交转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要形成新的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战略,除了需要继承和发展十八大以来的外交新理念、新方式、新举措外,中国还需从以下三个方面继续努力。

首先,在宏观层面上,要确定一个新的战略目标,即在2049年前成长为世界大国、强国。每个国家都有本国的外交战略目标,战略目标具有长远性、全局性和根本性,其他目标都服务或服从于它。美国的外交战略目标是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两个“一百年”,但是中国新的外交战略目标是什么?从国家领导人和官方文件的表述来看,应该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者说是“中国梦”,换言之,就是要成为世界大国。这是中国未来外交工作的“的”,是核心,是所有工作努力的方向。在确定了这个战略目标后,就要围绕这一目标,调整对外战略,调整工作思路,平衡工作重点,厘清国家利益清单,规划未来战略步骤和战略部署。

其次,在外交战略指导思想,要实现“三个调整”。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期内,在国家实力相对弱小、国际环境相对不利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中国外交战略的方法论之一是“重点论”,即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选择更重要的那个。十八大后,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增强,国际形势、国际格局发生了对中

国有利的显著变化,中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核心利益更加明确。这些有利条件使中国在实现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有更多可用资源、有更大回旋余地和更多选择空间。在此基础上,未来中国外交应该更加强调“两点论”,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实现战略思想上的“三个调整。具体而言,就是要从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调整为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从在和平时期更多强调发展利益调整到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强调发展利益与主权、安全利益并重;从主要强调抢抓和平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所带来的推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调整为既珍视和平的战略机遇,也重视国际形势、国际格局变化以及领土争端中所蕴藏的关于维护主权、安全和维护领土完整的战略机遇。

再次,在相对具体的外交操作层面,外交战略方针要实现“六个转变”。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根据当时国际风云变幻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在“韬光养晦”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综合实力迅速增强,战略目标基本实现。但长此以往,也导致中国外交出现了外交方针粗略化、外交行动被动化、外交战略碎片化、外交布局畸形化、外交谋略短期化、外交方式单一化等缺陷。未来若干年直至2049年,中国要成长为世界大国,对外战略方针必须要实现六个“转变”。

第一,外交方针由粗略化向细致化转变。以2049年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强国为总目标,在“宏观韬晦,微观积极;个案处理,一事一议”这个总体原则的指导下,对未来外交方针开展细致化研究,分阶段分区域分专题,细化外交方针。在宏观战略以及和中国利益关联较远的国际事务中,中国可以适当超脱。而在微观国际事务中,尤其是事关中国切身利益的地缘政治、主权安全、领土争端、能源资源等问题上,要积极有为。

第二,外交行动由被动化向主动化转变。在实力相对弱小、信心相对不足、国际经验相对欠缺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外交曾奉行“跟随”策略,在多边外交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随着中国实力的显著增强,中国外交更加积极、更加主动。今后,国际环境在总体上将会向着更加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中国外交更应积极有为。

第三,外交战略由碎片化向系统化转变。由于外交体制等多方面原因,中国外交领域一度存在各自为政、政令不畅、执行不力等问题。例如,在海洋执法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五龙闹海、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以来,迅速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海岸警卫队,在加强中央对外交事务领导权的同时,加强了具有对外职能的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并注重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顶层设计。随着国家利益不断国际化,中国需要更加强有力的领导机构,需要更加迅速有效的部门协调,并制定更加系统的战略目标。

第四,外交资源由集中化向多样化转变。当前,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七位一体”的外交布局,但相对来说,中国的外交资源过于集中在美国、欧洲、日本、东盟、俄罗斯和印度等重点国家和地区,而对广大亚非拉国家和中小国家投入的外交资源和精力则相对不足。对于大国外交的战略布局而言,既要关注重点国家和地区,也要关注亚非拉国家和中小国家,尤其是其中的关键国家,并保持外交资源的相对均衡性和快速流动性。

第五,外交谋略由短期化向长期化转变。未来中国的国家目标更加高端化,国家利益更加全面化,因此中国要改变过去“被动式”、“救火式”的外交谋略,而要对某些具体区域、具体国家和具体问题进行长期研究,制定长远规划。

第六,外交方式由单一化向全面化转变。在较长时期内,中国主要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处理国际问题。近年来,在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改善、国际话语权和规范性权力有效提升、社会文化交流迅速扩大的背景下,经济外交(高铁外交)、主场外交、多边外交和公共外交已经成为新的外交方式,并且效果显著。今后,中国要大力推进多样化、全面化外交,综合运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手段参与国际事务,开展多边双边外交。

注 释

① 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载于《人民论坛》2013年第8期。

② William Hilton,“A New Ambassador for Brand China,”China Today,June 2013,p40.

- ③ 李巍、孙忆：《理解中国经济外交》，载于《外交评论》2014年第4期。
- ④⑨ William A Callahan, "China's 'Asia Dream': The Belt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New Regional order", *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2016, Vol. 1 (3), p229, p239.
- ⑤ "Whose Splendid Isolation?" *Economist*, June 6th-12th 2015.
- ⑥ Sukjoon Yoon, "Implications of Xi Jinping's 'True Maritime Power'",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Summer 2015, p53.
- ⑦ 张清敏：《六十年来新中国外交布局的发展》，载于《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
- ⑧ 王逸舟：《有关中国外交政策分析的几点思考》，载于《外交评论》2010年第4期。
- ⑩ 赵可金：《中国外交3.0版：十八后中国外交的新走向》，载于《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
- ⑪ 《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2/t20160229_1323991.html)
- ⑫ 《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603/t20160309_1328611.html.)
- ⑬ 《国新办举行发布会介绍〈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相关情况》，中央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16-09/22/content_5110783.htm.)
- ⑭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人民日报》，2016年09月4日。
- ⑮ 百度百科：中国维和部队。
- ⑯ 习近平：《中国为和平而来》，外交部网 (<http://www.fmprc.gov.cn/ce/cegv/chn/zywjjh/t1310209.htm>.)
- ⑰ 这些数据主要根据外交部网站“资料”栏目中的“专题”统计而来，具体情况可访问如下网址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15nzt/.)
- ⑱ 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03月30日。
- ⑲ Matt Ferchen, "How New and Crafty is China's New Economic Statecraft", *Foreign Affairs*, 2016 March/April.
- ⑳ 陈虹晨：《中国对外“伙伴关系”大盘点》，腾讯网 (<http://finance.qq.com/a/20160415/021956.htm>.)
- ㉑ 胡宗山：《论新中国外交的不同形态、影响因素与未来转型》，载于《江汉论坛》2015年第10期。

[责任编辑 王建国]

New Diplomacy of China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u Zongshan Guo Bingyun

Abstract: After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hina raised a series of new diplomatic ideas, such as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Asia-Pacific Dream,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and coined a new diplomatic style on issues like protecting national interests, and showed new demeanor by came up with new initiatives like one belt on road and AIIB(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s a result, China did make a breakthrough and reach new achievements in the diplomatic area during the past years. Under these new changes and tendencies, the new direction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is becoming clear gradually. In order to make the new grand diplomatic strategy in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establish strategic goals as well as readjust strategic guiding thoughts and transform strategic guideline.

Key words: New Diplomacy; Transiti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